



思想

## 未富先老： 冒不起的险

——循环经济随笔之九



◎高辉清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发展战略处处长

世间的事情有时很奇怪，看似毫无关联的几件事情，最后却常常发现居然本质上紧密难分。

2004年8月，笔者还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指导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德教授有一天突然拿来一张《华盛顿邮报》，上面有一篇谈论中国人口“未富先老”的文章，建议笔者对此做些研究。应该说，中国人口问题与笔者作为访问学者的研究课题毫无关系，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接触过，但是我知道导师早在1994年就开始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为了不拂师意，所以写了一篇分析文章。沾了克劳德教授大名的光，该文在国内《经济》杂志上发表之后引起较大关注。然而，本人总觉得是做了一件与自己主业“毫无关联”的事。

几乎在同时，另一件“毫无关联”的事情又找上了门。由于当时国内刚刚开始注意循环经济，在上升示下，笔者利用在美国的便利开始收集有关国外循环经济发展的资料，由此介入了循环经济领域的研究。

真所谓“世事难料”，照目前的发展趋势，过去与主流研究“毫无关联”的循环经济势必将在主流研究中占据重要的席位，这一点在今年9月《循环经济法》如期通过之后会得到更为明显的验证。

中国近几年来事实上成了国际社会循环经济研究的领头羊，不少西方学者都是来到中国以后才对循环经济有了一个较系统的了解。应该说，这是中国学界的骄傲。但却是一个“被迫产生”的骄傲：一是中国正处于世界产业链条中的加工制造环节，经济、环境与资源的矛盾最易凸现；二是中国具有全世界最大规模、而且其结构可能也最不合理的人口。经济、环境与资源的不和谐，实质上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从某种意义上讲，循环经济的兴盛都是“人多惹的祸”！

我们不妨以土地为例。

通常情况下，最先开垦的土地是那些最肥沃的土地，开垦的土地越肥沃，数量越多，则粮食收获量越多，能供养的人口越多。但由于人口的增加，对食物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人们不得不开垦那些肥力低又不适宜于耕种的土地，以至于超过了土地的边际条件，产量的增长逐渐下降，并落后于人口的增长。于是，人们就只有以更大力度去更多地开垦那些不适宜耕种的土地，从而陷入了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

资源消耗不仅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而增多，而且也随着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增多。有关资料表明，公元前一个人平均每天大约消耗12升水，到了中世纪人均耗水量增至20至40升，到18世纪又增加到60

升；到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大城市每人每天耗水量则升至500升。除了居民生活用水之外，人类社会的工农业用水也与日俱增。据统计，每亩农作物生长期内的用水量，小麦为345至506立方米，棉花为333至400立方米；平均生产1吨谷物大约需要400立方米水；每生产1吨钢要耗水20至40立方米淡水；每生产1吨人造纤维要耗水1200至1800立方米淡水。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现在世界的用水量每15年左右要翻一番。

正因为如此，研究循环经济必须研究人口变化，研究人与经济、资源、环境的关系。否则永远只能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这一意义上讲，科学合理的人口政策才是循环经济能够得以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

然而，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我国人口政策正面临“两大危机”，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

首先是人口总规模过剩。2005年1月6日，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向世界宣布：“中国大陆总人口到今天达到13亿。”按每年新增1200万人计，到2010年，中国总人口将达到13.7亿。而再过22年(2033年)，将达到15亿的峰值。这一规模毫无疑问是太大了。从各主要资源的占有量来看，中国的人均水平大概在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之间。而按照现代生态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和美国发展重定义组织(Redefining Progress)两大非政府机构发布的最新测算结果，就2001年相对自然资源的支撑能力而言，全球人口已经过剩了21%。如果由这两个数据简单推断，中国人口已过剩了60%以上。即使将一些不可比因素剔除，根据专家测算，中国人口至少也过剩了30%！

其次是“未富先老”。有关统计显示，2000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7%，按照联合国划分标准，人口年龄结构已进入老年型。到2050年，老年人口比例最高峰值将上升到23%左右，高出世界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的9个百分点，步入超老龄化国家行列。

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相当显著。日本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曾经因为人口老龄化而进入了“失去的十年”。但是，在这十年中日本居民依然保持着较高的生活水平，社会安定也未出现太大问题。其中关键因素在于，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经济已高度发达，足以应对来自老龄化的挑战。

相比之下，别国在人均GDP5000至10000美元时进入老龄化社会，但2000年我国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对一个老龄化国家而言，经济增长乏力，同时尚无足够的财富积累，结果实在难以想象。

上述两大危机实际上相辅相成，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需要决策者的大智慧。而在笔者看来，“未富先老”的危机是人类历史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实在是冒不起的险。

知无不言

## 人口生产从来都是内生变量

在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货币文化时代，并非人口越多市场就一定越大，也不见得人口少市场就一定小，因为再多的穷人也支撑不起一个具有足够深度与宽度的市场。所以，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阶段，人口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人类的发展就是一个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相互协调统一的过程，两者均衡与否决定着社会发展的质量。

问题是，如何确保两者的均衡？

农业经济时代，人类的生产方式主要靠劳动与土地的投入。在土地还相对宽裕的条件下，劳动投入的多少就直接决定着产出量。因而绝大部分帝王都如同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一样：“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因为他们深深根植于“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以及“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的观念中。但是，人口增长并不快。1750年全球7.21亿人口比1000年时的2.65亿，仅增加了4.56亿。更由于农业经济遍布全球的同质性质，世界各地在这漫长的年代里的收入水平基本均等，在600至700美元左右(按1985年美元计算，下同)。

工业革命后，物质财富快速增长，人口开始大幅增长。有人看到了这种技术进步可能会导致“人口爆炸”，便提出了控制人口的主张。1798年32岁的未婚英国小伙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原理》，提出如果人口不加控制就会以几何级数增长的“马尔萨斯困境”，有关控制人口的主张更加理论体系化。在“马尔萨斯主义”的指导下，就有一些国家采取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但是，即便政策再严厉，世界人口还是从1800年的9亿增至2005年的65亿。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从前万难想象的增长速度，并没有降低人均物质财富量。即使当今收入最低的国家，人均GDP也比人口增长缓慢时代的600美元增长了近3倍，最富裕国家更是增长了60多倍。

那么，人口是否还是按过去200年或者过去30年那样的高速度增长下去而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呢？真实世界展现给我们的是，最早开始工业革命，或者受欧洲移民主导也相继受惠于工业革命的欧洲、美洲以及日本的生育率从18世纪就开始下降，这一趋势迄今还在加重。工业革命的典型经济体现即为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袁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考虑到今后中国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均衡需求，对“人口红利”、“老龄化”、“劳动力供求”等眼下热议的问题，应该还人口生产为内生变量的本来面目，少一些不必要的公共权力层面的担心与“关切”

长，因而可观察到的历史事实便是，随着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生育率与人口增长率是持续下降的。尽管过去205年里全球增加的56亿人中的近一半分布在除日本以外的亚洲与非洲地区，但这些都集中在1750以前同欧美处于同一经济水平的地区。从上世纪下半叶也开始了其后发性的工业革命，并且在过去30年里人均收入出现快速增长，如果这两个地区的工业革命能强劲地持续下去，其生育率与人口总量变动恐怕也难以避免已发生在先行者身上的下降趋势。实际上，这两个地区的生育率已经开始下降并趋于稳定。

可见，鼓励生育的公共政策并不见得会使人口就如政策预期的那样增长；控制生育的政策也未必能使人口少增长。过去农业社会如此，现代非农业社会更如此。当今世界，前者的典型例子是俄罗斯，不管莫斯科采取何种鼓励生育政策，其人口还是每年减少60至90万；后者如印度与中国，实施严格控制生育的政策，但人口还是没少增长。从更长的历史时期与全球视野观察得到的现实是，公共政策对人口生育率变迁所起作用不大，这是为什么？

也许从经济增长理论中会找到某种解释。对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技术并非只是收入持续增长的最重要决定力量。1750年之前，重大发明与技术进步并不少见，但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只是近两百年的事。正如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小罗伯特·卢卡斯所总结的：“被定义为收入持续增长起点的工业革命并不仅是一个技术事件，甚至并不主要是个技术事件。”促使持续的工业革命与收入的持续增长进而又引起生育率

下降的，从经济学上讲，是产权制度与人力资本。

只有当土地与资源明确了所有者时，所有者的收入才有可能超过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需要——温饱水平。在私有产权制度得以保障的条件下，加上人力资本的增长，才能使人均收入持续增长。而人力资本的增长，取决于人们确实能够切身享受到或者看到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不断提高的收益。所以，当特权阶层以外的普通民众也能有接受教育与知识积累的机会，并能够享受到或看到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带来本人或者他人经济状况与命运极大改善时，在这种投资收益提高的影响下，所有的理性普通家庭在生育决策上，就会很认真地在数量与质量上权衡。当人力资本投资越来越具有诱惑力，财务预算约束下的任何一对理性夫妇，会越来越偏重于孩子的数量，而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及其收益的持续提高。于是，人口质量的考虑优先于数量追求，以至于现今欧洲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实际上，中国近年也已出现了这一理论所解释的趋势。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今年刚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就明确指出：“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面临生育水平降低、人口老龄化加剧等突出问题。农村、中西部及贫困地区则生育水平较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难度很大。1978—2003年间全国净增人口3.25亿人，排除迁移因素，东部占33.9%，中部占35.6%，西部占30.5%；中西部人口自然增长率明显高于东部地区。”

上述简短理论分析和实践表明，人口生产是一个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家庭会主要根据对当前与未来经济条件发展的预期而自主理性地做出决策。既然是内生变量，作为外在力量的公共政策当然就作用微弱了。如此说来，考虑到今后中国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均衡需求，对于“人口红利”、“老龄化”、“劳动力供求”等眼下人们热议的问题，是否应该还人口生产或生育为内生变量的本来面目，少一些不必要的公共权力层面的担心与“关切”呢？

■ 世话实说

## 混业经营大潮疑思缕缕

19世纪经济学泰斗马歇尔曾说：“经济问题的魅力就在于它没有确定的答案”。对于混业经营，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了“国际潮流之下、整合效应之中、金融业大势所趋”的经典判词，以至于岁末年初一系列混业经营“提速”的消息纷至沓来之时，市场大多怀抱“春风终度玉门关”之激情为其打上“利好”标签。虽然其意可解，但失却与主流“背道而驰”的缕缕疑虑未免多少有些不尽完美。

当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盛行混业经营之时，中国金融业似乎有足够理由去追随国际潮流，不过问题在于，混业经营并非就是一种趋势确定的“国际潮流”，实际上，在混业大潮之中，国际金融业近年来就出现了些许“回流”迹象。以花旗银行为代表的一些金融巨头从2005年起就不断通过资本置换或逆向并购的方式“反台”非专精业务，在强化“核心竞争力”的策略指引之下悄然趋向分业经营。这种回归并不让人意外，更谈不上是历史倒退，因为从国际金融市场的历史演进来看，混业和分业之间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就像潮汐一样自然。从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诞生，到1989年欧共体全能银行制度的实行，从1992年日本《金融制度修正法》的颁布，到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通过，进而到近年来华尔街业务专精“暗流”的涌动，在经历了千山万水的长途跋涉后，起点和终点总是不可思议的彼此交替，金融业则在混业和分业的摇摆中不断蜿蜒前行。

可见，将混业经营定义为“国际潮流”本身就有失武断。更何况，即便混业经营构成了“国际潮流”，也并不意味着中国金融业有对其自然趋近的必要。笼统地看，三种市场需求构成了金融业经营模式的转变动力。居于宏观层次的是行业需求，在



◎程实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博士

成熟金融市场的活跃期，直接融资市场和间接融资市场之间的资金互动需求不可抑制，混业经营“鹊桥效应”将给金融融通创造多维空间。居于中观层次的是企业需求，在成熟企业的扩张期，对两种或多种行业领域的“国际潮流”，实际上，在混业大潮之中，国际金融业近年来就出现了些许“回流”迹象。以花旗银行为代表的一些金融巨头从2005年起就不断通过资本置换或逆向并购的方式“反台”非专精业务，在强化“核心竞争力”的策略指引之下悄然趋向分业经营。这种回归并不让人意外，更谈不上是历史倒退，因为从国际金融市场的历史演进来看，混业和分业之间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就像潮汐一样自然。从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诞生，到1989年欧共体全能银行制度的实行，从1992年日本《金融制度修正法》的颁布，到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通过，进而到近年来华尔街业务专精“暗流”的涌动，在经历了千山万水的长途跋涉后，起点和终点总是不可思议的彼此交替，金融业则在混业和分业的摇摆中不断蜿蜒前行。

当然，如果金融行业的配置优化和金融企业的效率提升能为金融服务有效供给创造有利条件，那当然对微观需求的间接满足不无裨益。但问题是，市场主体耳熟能详的“规模效应、范围效应、整合效应和风险规避效应”并非与混业经营如影随形，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而为枳”，混业经营在不同的金融生态下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影响。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劣势并不在经营模式本身，而在管理方法、业务设置、行业经验、资本实力和人力资源上的差距，改变经营模式也无法在“神似”之中谋求内功提升。就像姚明不一定是排球高手，刘翔也不一定突然变成百米飞人一样，“术业有专攻”对于“核心竞争力”的巩固和增强在大多数市场环境中有利的，况且中国金融企业自身的整体实力和行业地位都远没有达到姚明和刘翔在篮球和110米栏项目上的高度，混业经营在如此背景之下能否给企业长期成长带来助力实难定论。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混业经营的限制放开，中国金融企业很可能并不在乎所谓“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毕竟在中国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之下，“大不一定就强，强却一定要大”，“大而不倒效应”会引致金融企业横向扩张的“野兽冲动”，这种一拥而上的混业热潮会给企业和行业同时带来不可回避的风险加成。

对混业经营的疑虑最终只是加强了另一个经典结论：“混业经营需稳健前行”。混业经营过热，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证券市场2006牛市和银行业改革新机遇共同催化的结果，毕竟在金融市场全面走强之际，混业经营更像是短期的“利益共享”，而非长期的“风险分担”，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现时市场所津津乐道的“大势所趋”很多时候恐怕是“小势所趋”而已。

当然，如果金融行业的配置优化和金融企业的效率提升能为金融服务有效供给创造有利条件，那当然对微观需求的间接满足不无裨益。但问题是，市场主体耳熟能详的“规模效应、范围效应、整合效应和风险规避效应”并非与混业经营如影随形，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而为枳”，混业经营在不同的金融生态下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影响。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劣势并不在经营模式本身，而在管理方法、业务设置、行业经验、资本实力和人力资源上的差距，改变经营模式也无法在“神似”之中谋求内功提升。就像姚明不一定是排球高手，刘翔也不一定突然变成百米飞人一样，“术业有专攻”对于“核心竞争力”的巩固和增强在大多数市场环境中有利的，况且中国金融企业自身的整体实力和行业地位都远没有达到姚明和刘翔在篮球和110米栏项目上的高度，混业经营在如此背景之下能否给企业长期成长带来助力实难定论。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混业经营的限制放开，中国金融企业很可能并不在乎所谓“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毕竟在中国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之下，“大不一定就强，强却一定要大”，“大而不倒效应”会引致金融企业横向扩张的“野兽冲动”，这种一拥而上的混业热潮会给企业和行业同时带来不可回避的风险加成。

对混业经营的疑虑最终只是加强了另一个经典结论：“混业经营需稳健前行”。混业经营过热，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证券市场2006牛市和银行业改革新机遇共同催化的结果，毕竟在金融市场全面走强之际，混业经营更像是短期的“利益共享”，而非长期的“风险分担”，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现时市场所津津乐道的“大势所趋”很多时候恐怕是“小势所趋”而已。

■ 醒客一周

## 数字化生存 悬于一线



◎周年洋

学术编辑 专栏作者 现居北京

当世人刚想为世界变平了而欢呼时，一场台湾海峡7.1级的大地震，突然把大家从数字化生存的狂欢中震醒：原来，世界还是圆的，时空的距离依然实实在在地，高山大海还在阻碍着人类的即时沟通。

只因漂浮在海底的几条光缆的断裂，中国网民上不了大部分国际网站，国内外的电子邮件收发受阻，1500万MSN用户无法正常登录，那些依赖MSN联系客户的人一筹莫展，亚洲部分地区市场的外汇和其他金融交易被迫中止，海运和物流行业无法与客户及时沟通。

我们曾经无比欣喜的数字化生存竟然悬于一线！这彰显出今天人类世界的脆弱。科技越来越发达，一些体积上很小的东西承载了越来越大的分量，似乎是一根小小的杠杆具有了撬起几万吨或几十万吨于自己的能量。

今天发达的高科技，使我们能够建造鬼斧神工的高科技产品，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行进海底深处的核潜艇、广阔的海上钻井平台、拦截大河的大坝、爆炸力异常强大的原子弹、小的还有电脑病毒、未来的生物芯片等等。每一种高科技产品都积聚着强大的危害力，越小的东西越具有毁灭地球的能力。

文明的脆弱就潜藏在这种过分依赖于高科技的承载上。互联网网让我们心神不宁，当年的千年虫问题几乎让人感到世界末日来临。“9.11”创痛巨深，是因为只有像世界贸易中心这样的摩天大楼才能在短时间造成如此重大后果，在建造不了摩天高楼的时代，一幢楼的爆炸和倒塌是不可能造成这么多的人员伤亡的。更有甚者，这样的高楼往往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发生问题，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同时遭受重大损失。

文明总在向前发展，日新月异的科技产品以微小的体积积聚着越来越大的摧毁力量。技术的突飞猛进，让我们在更好地控制社会和自然，使生活更便捷的同时，也积聚着更大的毁灭自身的力量。更小的东西正在主宰着人类的命运，那些控制着导弹、原子弹的电子遥控器，稍有疏忽，地球文明可能毁灭无数次，还有那些电脑病毒一旦入侵国防或者金融领域，可能造成的损失，简直无法想象，更有甚者，当今正在研制生物芯片，而当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身上装有各种生物芯片时，一个小小失误或者一个病毒程序就会让人类陷入灭顶之灾。所有的新技术是效用越大，副作用越大。科技发展，人类征服外界的力量越强，但毁灭自己的力量也更强大。这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悖论：面对科技的发展，人类越发不能主宰自己，人类文明似乎更为脆弱。

文明为什么如此脆弱呢？因为文明遵循规则，文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制定规则和完善规则的过程。这种规则主要是要求人们在心灵上接受它，按照它的要求去行动，在矛盾的纷争中诉诸于这些规则，而不是诉诸于自然的强健或武力，这些规则就是道德、法律和习俗等等，还有就是近代发展起来的民主和自由。民主这种制度已经是大势所趋，但这种制度本身是最没有力量的，它需要利益各方的妥协，它需要利益各方主动去遵循，互相制衡才能保护民主本身，只要有人不遵循民主，信仰民主的人就会受到损害。而自由更是如此，自由本身就包括约束，自由要靠自由本身来保护自己，自由是最脆弱的，只要有人要求毫无约束的自由，自由就要受到损害。回到那句俗语，当一个讲理的人遇到一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或者力大无比的野蛮人时，失败的是谁？不用说了，肯定是那个讲理的人。大家都讲理的时候，讲规则的人才会赢，而只要有一人要动武，规则就是一纸空文，毫无力量。规则的脆弱表明文明的脆弱。

文明积聚了太多危害人类自身的毁灭性力量，而文明又只能在大家都守规则的情况下，才有力量去保存。这次的互联网断网源于自然的一次并不算大的灾难，如果更大的灾难恰好又针对人类广泛运用的技术时，世界经济如何运行？人类生活如何延续？面对数字化生存悬于一线甚至人类未来都命悬一线这样的险境，人类该怎样避免进退失据呢？是静下心来好好思索这个疑问的时候了。